

不朽神兵—— 帶銘文吳越兵器賞析

■ 王詩涵

提到吳越神兵之名，許多人可能會想起干將、莫邪的故事；而在東周時期，吳越兵器之名也同樣家喻戶曉。但神兵之名是從何而來的呢？透過現存帶銘文的吳越兵器與相關作品，本文總結了吳越兵器在功能與設計上的數項成就。鋒利無鏽的劍刃、因應不同功能而以不同合金鑄成的劍身、刃部的細緻紋樣、以各種鑲嵌裝飾的銘文等，在在顯示出吳越工匠高超的鑄造技術與源源不絕的創造力。

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系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史記·吳太伯世家》）¹

《史記》記載的這一則季札掛劍故事，相信許多人都都不陌生。來自吳國的公子季札遵守自己未曾言明的承諾，在結束外交旅行之後，將自己隨身的寶劍留在徐國國君的墓前。透過這則故事，太史公（約 145-86 BCE）爲季札創造了一個守信重義、風度翩翩的形象，讓人爲之傾倒。雖然季札之劍只是一個引子，但徐國國君對季札之劍的興趣，可能也不是純粹爲敘事服務的空穴來風。

儘管位處中原之邊陲，位在長江下游的吳越兩國，卻以其鑄造兵器的技術爲世人所知。除了《史記》中徐國國君對季札佩劍表現出高度興趣的情節，《呂氏春秋》在提醒國君需要

仔細分辨真正的賢臣、不要被表面功夫所蒙蔽時，也以吳國兵器與它的仿冒品做爲其中一個例子：「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² 仿冒品的產生，反映的是真品的貴重與難得，因此，雖然沒有直接描述吳國兵器的精良或特性，《呂氏春秋》中的這條資料仍然透露出吳國兵器在東周時期的珍貴與搶手。

吳越兩國的兵器爲何在東周列國之間如此炙手可熱？我們可以從考古與傳世所見的吳越兵器中一窺一二。

吳越兵器概說

兵器是中國青銅器的重要類別之一，考古與傳世所見的青銅兵器可謂多不勝數。而由於兵器在防禦、禮儀等多重面向上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先秦諸國不論強弱，都會鑄造相當

數量的銅兵器。但多數銅兵器並不像現代工業產品會標記產地，因此，帶有銘文的作品即成為識別與研究銅兵器時的關鍵。本文的介紹，也將以帶銘文的吳越兵器為中心，旁及部份形制或鑄造技法接近的無銘文作品。

根據筆者整理，目前見於各類報導的帶銘文吳越兵器約有 160 件，其中以劍為大宗，約有 130 件，其它則為戈、矛、戟等長兵器。雖然數量可觀，但這些作品大多數為傳世器，帶有出土資訊的只有 50 件左右。而在有出土資訊的帶銘文吳越兵器中，只有 5 件來自吳越兩國所在的江浙一帶，其它則是在湖北、安徽、山

東、山西等地發現。（圖 1）這樣的現象可能跟葬俗有關：浙江地區的越國貴族墓葬不隨葬青銅器，而是代之以瓷器、石器製作的青銅禮樂器與兵器的模型。雖然葬俗的差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長江下游較少出土越國兵器的情況，但這些帶銘文兵器如何來到楚、蔡、晉、秦等國家的墓葬中，學者則有戰利品、外交禮物等不同的看法，不過目前尚難有定論。

鋒利與強韌

吳越兵器第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特點是，經過了兩千多年在地下的沉睡或是藏家之間的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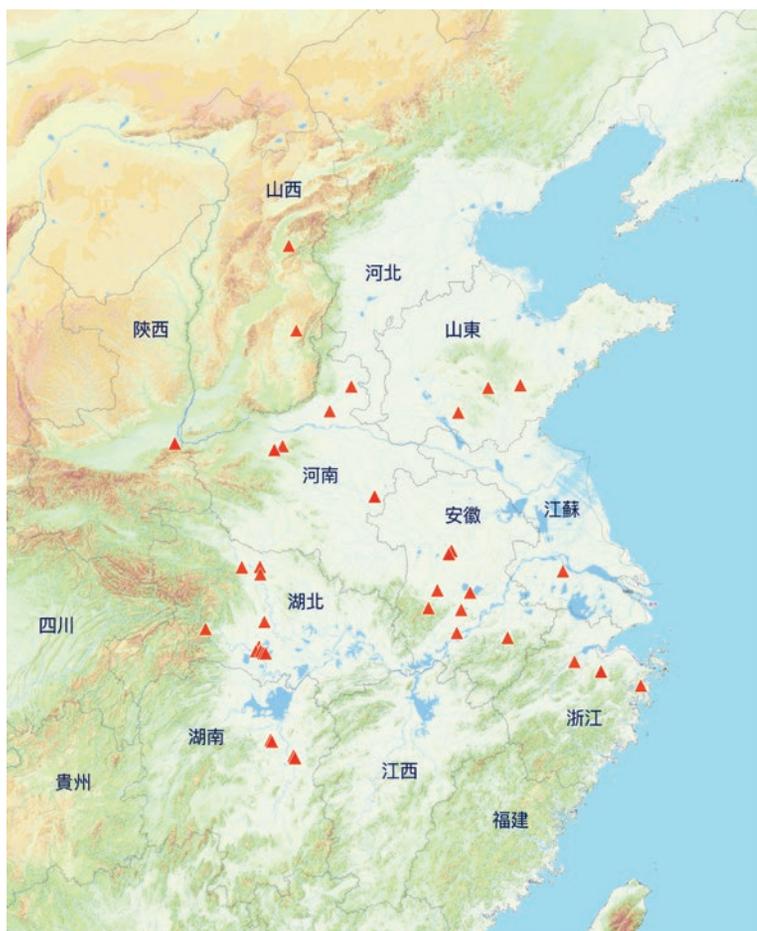


圖 1 吳越帶銘文青銅兵器出土地點分布圖 作者以 DocuGIS 製圖



圖 2 春秋 越王句踐劍 長 55.7 公分 湖北江陵望山一號墓 取自荊州博物館，《荊州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 125。

轉流傳，許多作品仍然鋒利如新。例如出土於湖北江陵望山一號墓的〈越王句踐劍〉。（圖2）

除了尚未被破解的抗鏽技術，吳越工匠還發展出了被學者稱爲「複合劍」的技術，在不同部位運用不同組成的青銅原料，以同時強化不同部位的性能。青銅是一種合金，主要的成分是銅與錫。錫在銅液中的比例會影響成品的性質：錫的含量高，則合金堅硬但易脆；錫含量較低，合金則會比較強韌。一把劍的劍刃需要堅硬銳利，才能達到最高的殺傷力。而劍脊做爲一把劍的核心支柱，需要能夠承受衝擊。若劍脊能略有韌性與彈性，則可以在維持形狀方面有更好的表現。綜合兩者，若要最佳化劍脊與劍刃各自的性能，劍刃應該以錫含量較高的青銅製作，而劍脊則應該選擇錫含量較低的配方。

但不同配方的部位勢必要分開鑄造，如何



圖3 上海博物館所藏的殘劍截面，從圖中可以看到劍脊的金屬顏色較兩側略深，表示二者配方稍有不同。取自程義，《吳越鑄劍三絕研究新進展》，《大眾考古》，2022年12期，頁20。



圖4 山東新泰周家莊一號墓出土的複合劍劍身截面，圖中劍脊周圍有四塊區域顏色較深，由錫含量較低的青銅製成。取自丁忠明等，《山東新泰出土東周青銅複合劍製作技術研究》，頁79。

將不同部位結合在一起、又不損及其功能，便成爲工匠們的新考驗。如果劍脊與劍刃的結合不良，則不管兩個部份各自的性能有多麼出色，也無法完全發揮。在過去，銅劍往往是以一體成形的的方式生產，雖然工匠需要在兩種性能之間做出妥協，但這樣的鑄造方式至少可以確保劍刃不會脫落，讓銅劍能維持基本的功能。學者的分析顯示，爲了發揮不同合金的長處，吳越工匠可能做了幾種不同的嘗試。如上海博物館所藏的殘劍，是劍脊先鑄，脊上向外延伸出楯頭，鑄造劍刃時包裹住楯頭以連結兩者（圖3）；而山東新泰周家莊一號墓（戰國早期）中編號57的複合劍，則是以高錫青銅渾鑄劍身，但在將劍脊周圍以錫含量較低的青銅加強。³（圖4）

儘管複合劍的性能應該相當驚人，但從極爲有限的數量來看，能夠妥善結合不同合金並且能投入實際使用的作品似乎不多。這樣的劍在春秋戰國時期，大概也是非常珍貴的。

神秘的刃上紋樣

在卓越的性能表現之外，吳越兵器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部份作品在刃面上所裝飾的黑色菱格紋。以出土於湖北江陵望山一號墓的〈越王句踐劍〉爲例，其劍刃刃面上的紋樣以交叉的黑色雙斜線爲底，每個雙斜線交匯處又加上一個菱形，紋樣以劍脊爲軸，左右對稱，細緻規整，紋飾之上又鑄有鳥蟲書銘文。（見圖2）類似的紋樣亦見於出土於湖北江陵馬山五號墓的〈吳王夫差矛〉。（圖5）與〈越王句踐劍〉不同的是，〈吳王夫差矛〉以短線代替雙斜線交匯處的菱形，且紋樣並未與銘文重疊。在安徽銅陵亦出土了一件銅矛有類似的刃面紋樣，但矛面上的雙斜線間距不一，劍脊左右紋樣不完全對稱，且雙斜線交匯處未有其它裝飾（圖6），



圖5 春秋 吳王夫差矛 長 29.5 公分 湖北江陵馬山五號墓 取自荊州博物館，《荊州重要考古發現》，頁 126。



圖6 春秋 菱格紋矛 殘長 19.3 公分 安徽銅陵出土 取自安徽大學、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 215。

在做工的精細程度上，稍遜前述兩件兵器一籌。根據學者的分析與實驗，這些刃面上的黑色線條在埋入土中之前可能是黃色的，而刃身則呈現偏白的色澤，在視覺上應該相當耀眼奪目，與目前所見的古樸渾厚不同。⁴

目前我們無法確知這樣的菱格是否是一種裝飾。但劍身、矛身是兵器重要的功能部位，在其上施加花紋卻不會影響其原本的功能，甚至可能幫助兵器有更好的表現，顯然是技術上

的一大進步。由於這樣的紋飾僅見於吳越兵器或是長江下游地區，吳越兩國工匠可能是這項技術的唯一擁有者。

有趣的是，根據歷史記載，吳越之間衝突不斷，尤其吳王夫差（?-473 BCE）與越王句踐（?-464 BCE）之間，更是有著血海深仇。在雙方交惡的情況下，兩國工匠為何能作出類似的作品？目前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明確地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只能設想各種可能的情境。例如，這

也許是吳越工匠各憑本事的結果：由於〈越王句踐劍〉中銘文覆蓋在菱格紋上，而〈吳王夫差矛〉的菱格紋則避開了銘文所在的位置，不同的處理方式表示兩件兵器的製作方式略有差異，也就是兩國工匠各自以不同的方式達到類似的結果，只是我們無法知道誰才是這個設計的原創者。或者，技術的流通超越了軍事上的對立，吳越兩國工匠能夠跨越政治界線交流技術，甚至服務來自敵對國家的贊助者。又或是，句踐在滅吳後接收了吳國工匠，獲得了原本屬於敵方的技術。無論如何，菱格紋兵器不僅讓我們看到吳越工匠卓越的鑄造技術，也提醒了我們兩國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長銘文、鳥蟲書與鑲嵌

在銘文的內容、書風與裝飾手法上，吳越兵器也有獨特之處。

東周列國貴族在鑄造自用的兵器時，常會在兵器上加鑄銘文，表明自己的身份，如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春秋晚期〈蔡公子從之用戈〉（見圖 11）的銘文為「蔡公子從之用」、出土於山西太原金勝村二五一號墓的春秋晚期〈趙孟戈〉銘文為「趙孟之御戈」。少部份兵器銘文的篇幅較長，如出土於河南淅川下寺二號墓，同為春秋晚期的〈柎戈〉有銘文約 22 字，器主以之表示自己受到楚王之命，將努力為楚王服務。吳越兵器也同樣有以描述器主身份為主要資訊的銘文，如前文提到的〈越王句踐劍〉及〈吳王夫差矛〉，銘文分別為「越王句踐自作用劍」及「吳王夫差自作用鋸」。但有兩件吳國銅劍的銘文卻長達 75 字。以現藏蘇州博物館的〈吳王餘昧劍〉為例（圖 7），其銘文除了器主身份，亦提到器主過去擊敗楚軍、抵禦越軍入侵的功德，是東周兵器銘文中最長的一篇，其所記錄的戰功，

也是學者認識吳國歷史時的重要材料。

前文提到的〈越王句踐劍〉、〈吳王夫差矛〉，以及〈吳王餘昧劍〉的銘文都鑄在劍身上，但在吳越銅劍中，也有將銘文鑄在劍格與劍首的例子。劍格是劍刃與劍柄之間，作為護手的部位；劍首則是劍柄末端的裝飾。在吳越兩國的作品中，將銘文鑄在劍格和劍首以越國銅劍較為常見：在目前所見的 50 件吳國銅劍中，只有一件來自私人收藏的〈吳王光劍〉將銘文鑄在劍格和劍首上；而在 107 件越國銅劍中，有 88 件的銘文鑄在劍格上，其中有 27 件同時也在劍首處



圖 7 春秋〈吳王餘昧劍〉及其銘文摹本 長 57.5 公分 蘇州博物館藏 取自程義、張軍政，〈蘇州博物館新入藏吳王餘昧劍初探〉，《文物》，2015 年 9 期，頁 77、81。



圖 8-1 戰國 越王州句劍 長 51.7 公分
蘇州博物館藏 取自王振華著，古
越閣編輯，《商周青銅兵器》，臺
北：古越閣，1993，頁 81。



圖 8-2 〈越王州句劍〉劍格特寫。從圖片中可以看到，浮雕
的銘文之下還襯有紡織品一樣的紋樣。



圖 9-2 〈越王丌北古劍〉劍首（上）與劍格（下）特寫。銘
文採取間格錯金銀的方式裝飾，而銘文的筆畫則較為
線條化。



圖 9-1 戰國 越王丌北古劍 長 64 公分
安徽安慶王家山一號戰國墓 取自
安徽博物院，《安徽文明史陳列》，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 154-
155。

鑄有銘文。如現藏於蘇州博物館的〈越王州句劍〉分別在劍格的正反面鑄有銘文「越王州句州句」與重複的「自作用劍」（圖 8）；而出土於安徽安慶王家山一號戰國墓的〈越王丌北古劍〉則在劍格與劍首處都鑄有銘文，劍格銘文為重覆、橫書的「越王丌北古」，而劍首處則為「唯

越王丌北自作元之用之劍」。（圖 9）

另一方面，吳越兵器銘文時常採用藝術字體書寫，也就是所謂的「鳥蟲書」。如前述〈越王句踐劍〉的銘文，即是以筆畫有肥瘦變化、且有許多飾筆的字體寫成。（見圖 2）上海博物館所藏的〈吳王光戈〉雖然飾筆較不明顯，仍可以



圖 10 春秋 吳王光戈 長 25.2 公分 上海博物館藏 取自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東周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268。



圖 11 春秋 蔡公子從之用戈 長 25.4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銅 000030
銘文取自陳芳妹，〈臺北故宮的蔡國戈〉，收入馬承源主編，《吳越地區青銅器研究論文集》，香港：兩木出版社，1997，頁 255。

清楚看到宛轉的筆畫與修長的字形。(圖 10) 吳越兩國使用鳥蟲書可能與鄰近楚、蔡等國有關。儘管風格不同，楚、蔡、曾等國的銅器上都可以見到加有飾筆、形體修長的鳥蟲書銘文。如前文中來自蔡國的〈蔡公子從之用戈〉(圖 11)，或是與〈棚戈〉出自同一楚國貴族墓的〈王孫誥戟〉(圖 12)，都是採用筆畫有肥瘦變化、結構比例修長的藝術字體。

儘管鳥蟲書銘文本身的變化已富有高度可



圖 12 春秋 王孫誥戟 長 27.4 公分 河南浙川下寺二號墓 取自浙川縣博物館，《浙川楚國青銅器精粹》，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頁 141。

看性，許多東周貴族尚不滿足於此。他們還會再為銘文錯金或錯銀，使銘文更為醒目，前述〈越王句踐劍〉、〈蔡公子從戈〉以及〈王孫誥戟〉均是如此。而在越國工匠的作品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除了錯金銀之外的不同裝飾手法。

如圖 8 的〈越王州句劍〉，其銘文是以浮雕的方式呈現，襯以細小的斜紋為底，營造出有如刺繡的視覺效果。在書寫風格上，〈越王州句劍〉的銘文與〈越王句踐劍〉類似，都採取了筆畫肥瘦變化誇張、鳥首筆明顯的寫法。而圖 9 的〈越王丌北古劍〉則是以錯金與錯銀間隔的方式妝點銘文，銘文的筆畫則粗細一致，鳥首筆也趨向抽象。與〈越王丌北古劍〉的劍首有類似銘文裝飾的作品還有現藏於紹興博物館的〈越王

不光劍〉，但它的劍格較窄，因此劍格的鑲嵌銘文需要將劍橫放才能閱讀。（圖 13）

除了斜紋底與間隔錯金銀這兩種裝飾銘文的方式，現藏蘇州博物館的〈越王諸稽於賜劍〉，劍格處以鑲嵌綠松石為地，銘文以雙陽線勾勒外框，筆畫本身現為凹槽，可能銘文原本也有鑲嵌；在字體上，〈越王諸稽於賜劍〉的銘文較之〈越王州句劍〉，每一筆畫的粗細變化也較少，可能是受限於鑲嵌或是雙線外框之所需。（圖 14）

有趣的是，每一位國君所擁有的兵器似乎會有專屬的設計，而且我們可以觀察到同一位國君的銅劍會重覆使用該專屬設計的情況。例如，藏於澳門珍秦齋的〈越王諸稽於賜劍〉，



圖 13 戰國 越王不光劍 長 67.3 公分 紹興博物館藏 取自蘇州博物館編，《大邦之夢：吳越楚青銅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頁 26-27。



圖 14 戰國 越王諸稽於賜劍 長 53.8 公分 蘇州博物館藏 取自蘇州博物館編著，《吳鈞重輝：蘇州博物館新入藏青銅兵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頁 73。



圖 15-1 戰國 越王諸稽於賜劍 長 60.6 公分
澳門珍秦齋藏 取自仇麗芬總編輯，
《珍秦琳琅：秦青銅文明》，澳門：澳
門特別行政區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
2009，頁 56-57。



圖 15-2 〈越王諸稽於賜劍〉正反面劍格



圖 16-2 〈越王州句劍〉正反面劍格



圖 16-1 戰國 越王州句劍 長 43 公分 澳門
珍秦齋藏 取自仇麗芬總編輯，《珍
秦琳琅：秦青銅文明》，頁 58-59。



圖 17 戰國 越王嗣旨不光劍 長 40.7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 000422

劍格銘文與蘇州博物館所藏的同銘劍相同，亦用雙陽線勾勒外框，也同樣有殘餘的綠松石鑲嵌於銘文周圍（見圖 14、15）；而珍秦齋所藏的〈越王州句劍〉則和古越閣所藏的同銘劍一樣，有類似編織紋樣作為浮雕銘文的地紋。（見圖 8、16）另一方面，雖然圖 13 的〈越王不光劍〉和圖 9 的〈越王丌北古劍〉有類似的劍首銘文，但前者的劍格多半較窄，而後者則多半較寬。換言之，不光與丌北古兩位越王所擁有的銅劍，在設計上並不完全相同。

為銘文文字鑲嵌，或是加上不同的地紋設計，並不見於東周以前的銅器。而東周以後的列國貴族以錯金銀、鳥蟲書等方式將銘文加以美化，使銘文既維持著原本的表意功能，又同時成為銅器裝飾的一部份。而越國的贊助者與工匠延續這樣的思維並加以闡發，在銅劍銘文的製作上結合不同的設計與裝飾技巧，讓越國銅劍相比於其它國家的作品又更為多彩多姿。朝著銘文裝飾化的方向再進一步，則會出現銘文的裝飾性超過原本標誌器主身分、傳達訊息等功能的現象。如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越王嗣旨不光劍〉，劍首處的 12 字銘文以間隔錯金、錯銀的方式裝飾，銘文以粗細相同的細線書寫，作法與前述〈越王丌北古劍〉、〈越王不光劍〉類似。但與〈越王丌北古劍〉、〈越王不光劍〉不同的是，〈越王嗣旨不光劍〉劍

格處的銘文已被曲折線紋取代，而劍首的 12 個銘文則難以釋讀。（圖 17）這似乎表示，當工匠和贊助者在製作〈越王嗣旨不光劍〉時，他們重視銘文所帶來的裝飾效果更勝於表意的功能，因此所追求的不是文字結構與筆畫的正確，而是錯金銀銘文帶來的視覺美感。

結語

吳越兵器既是武器，也是藝術品；工匠不僅在功能上改良翻新，也在視覺設計上不斷發揮創意。吳越工匠所發展出的鑄造與紋飾技術，可謂當時最先進的科技成就。在烽火不斷、外交活動頻繁的東周時代，這些默默無聞的工匠們不僅幫助軍隊在短兵相接的戰場上贏得勝利，也讓貴族在無硝煙的外交戰場中，以裝飾華美、鋒利無匹的銅劍展示自身的軍事與技術實力，折服對手於言談行走之間，或是獲得新的盟友與支持。除此之外，他們還讓吳越兩國在後代獲得了名鑄的形象與神話，即使兩國早已滅亡，干將、莫邪、歐冶子之名仍然為現代人所熟悉。不論現代或是古代，技術與創新都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力，可以超越地理空間的限制，也超越時間長河的世代更迭。因為有這些精彩的兵器訴說著吳越的故事，我們因此會繼續記得吳越、季札與他的劍，彷彿他們從來不曾離開過。

作者為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

註釋：

1. (西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據清同治金陵書局本影印)，卷 31，〈吳太伯世家〉，頁 1459。
2. 許維遙，《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6)，卷 22，〈慎行論·疑似〉，頁 529-530。
3. 丁忠明、曲傳剛、劉延常、吳來明、穆紅梅，〈山東新泰出土東周青銅復合劍製作技術研究〉，《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卷 24 增刊(2012.12)，頁 75-86。
4. 譚德睿等，〈東周銅兵器菱形紋飾技術研究〉，《考古學報》，2000 年 1 期，頁 111-146。